



华侨大学
HUAQIAO UNIVERSITY

哲学社会科学文库·哲学系列

文库主编：贾益民

中庸原论

儒家情感形上学之创发与潜变

A STUDY ON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The creation and

evolution of Confucianism's moral

杨少涵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华侨大学
HUAQIAO UNIVERSITY

哲学社会科学文库·哲

文库主编：贾益民

中庸原论

儒家情感形上学之创发与潜变

A STUDY ON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The creation and
evolution of Confucianism's moral*

杨少涵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庸原论:儒家情感形上学之创发与潜变 / 杨少涵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11

(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库·哲学系列)

ISBN 978 - 7 - 5097 - 8144 - 9

I. ①中… II. ①杨… III. ①儒家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①B222.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2664 号

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库·哲学系列

中庸原论

——儒家情感形上学之创发与潜变

著 者 / 杨少涵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王 维 刘 荣

责任编辑 / 赵子光 韩晓婵 刘 荣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 ssap. com. cn](http://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0.25 字 数: 494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8144 - 9

定 价 / 12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编 贾益民

副主编 曾 路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海生	王四达	王丽霞	庄国土	许少波	许斗斗	许培源
孙 锐	孙汝建	孙德明	李拉亚	李景源	宋振镇	张向前
张禹东	陈旋波	林怀艺	周世兴	郑向敏	郑锦扬	赵昕东
胡日东	胡培安	骆克任	贾益民	郭克莎	黄小萍	黄远水
梁 宁	程一辉	曾 路				

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专项资助计划资助

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推动文化传承创新

——《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库》总序

哲学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构建人类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的科学，是人类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其积极成果有助于提升人的素质、实现人的价值。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拥有丰富的文化历史资源，中华文化的发展是世界文化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因此，努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全面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对于推进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进程具有深远的意义。

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进入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迫切需要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和服务社会的作用。因此，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先后出台《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的通知》《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全面部署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各项工作，全面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高等学校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承担者。因此，高校有责任担负起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激发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的科研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和环境，致力于打造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精品力作。

华侨大学是我国著名的华侨高等学府，也是中国面向海外开展华文教育的重要基地，办学55年以来，始终坚持“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的办学方针，秉承“为侨服务，传播中华文化”的办学宗旨，贯彻“会通中外，并育德才”的办学理念，坚定不移地走内涵发展之路、特色兴校之路、人才强校之路，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整体办学水平，致力于建设基础雄厚、特色鲜明、海内外著名的高水平大学。

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历史时期，华侨大学敏锐洞察和把握发展机遇，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六中全会、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大力繁荣哲学社会科学。

一方面，华侨大学扎根侨校土壤，牢记侨校使命，坚持特色发展、内涵发展，其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彰显独特个性。“为侨服务，传播中华文化”是华侨大学的办学宗旨与神圣使命，其办学活动及其成果直接服务于国家侨务工作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此，华侨大学积极承担涉侨研究，整合、利用优势资源，努力打造具有侨校特色的新型智库，在海外华文教育、侨务理论、侨务政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海外华人社团、侨务公共外交、华商研究、海外宗教文化研究等诸多领域形成具有特色的研究方向，推出了以《华侨华人蓝皮书：华侨华人研究报告》《世界华文教育年鉴》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另一方面，华侨大学紧紧抓住国家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机遇，积极响应教育部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部署，颁布实施《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2—2020）》，为今后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发展纲领与制度保证。该计划明确了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战略目标，即紧抓国家繁荣发展哲学科学的战略机遇，遵循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发挥综合大学和侨校优势，通过若干年努力，使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方向更加凝练，优势更加突出，特色更加鲜明，平台更加坚实；形成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具有国家竞争力的高水平学术队伍；研究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服务国家侨务工作的能力明显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不断提高，适应文化建设新要求、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的作用更加凸显；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展，国

际文化对话与传播能力进一步增强。到2020年,力争使华侨大学成为国内外著名的文化传承与知识创新高地,国家侨务工作的核心智库,提供社会服务、解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重要阵地。

为切实有效落实《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2—2020)》,学校先后启动了“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者成长工程”“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论文专项资助计划”“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专项资助计划”“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百名优秀学者培育计划”“华侨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培育与发展计划”五大计划,并制定了相应的文件保证计划的有效实施,切实推进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专项资助计划”作为《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2—2020)》的重要配套子计划,旨在产出一批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力的高水平原创性研究成果,打造学术精品力作。作为此资助计划的重要成果——《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库》将陆续推出一批具有相当学术参考价值的学术著作。这些著作凝聚着华大文科学者的心力、心气与智慧:他们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关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他们以国际视野为基础,不断探索开拓学术研究领域;他们以学术精品为目标,积聚多年的研判与思考。

《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库》按学科门类划分系列,共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艺术学八个系列,内容涵盖哲学、应用经济、法学、国际政治、华商研究、旅游管理、依法治国、中华文化研究、海外华文教育等基础理论与特色研究,其选题紧跟时代问题和人民需求,瞄准学术前沿,致力于解决国家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新困境,其成果直接或间接服务于国家侨务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于国家华文教育事业与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可以说,该文库的打造是华侨大学展示自身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力、创造力、价值引领力,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次大胆尝试。

《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2—2020)》已经实施近两年,经过全校上下的共同努力,华侨大学的文科整体实力正在逐步提升,一大批高水平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一批高级别科研项目 and 科研成果奖成功获评。作为华侨大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成果,《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库》集中反映了当前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

充分发挥了优秀学者的示范带动作用，大力展示了青年学者的学术爆发力和创造力，必将鼓励和带动更多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青年教师以闽南地区“爱拼才会赢”的精神与斗志，不断营造积极向上、勇攀高峰的学术氛围，努力打造更多造福于国家与人民的精品力作。

当然，由于华侨大学面临的历史和现实等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以及华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视野与学术积累的局限性，《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库》在研究水平、研究方法等方面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我们在此真诚地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让我们共同期待《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库》付梓，为即将迎来 55 岁华诞的华侨大学献礼！让我们一起祝福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蒸蒸日上！让我们以更大的决心、更宽广的视野、更精心的设计、更有效的措施、更优质的服务，培育华大社科的繁花硕果，以点滴江河的态势，加速推进华侨大学建设成基础雄厚、特色鲜明、海内外著名的高水平大学，更好地服务海外华侨华人，支持国家侨务工作，配合国家发展战略！

华侨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贾益民

2015 年 4 月 28 日于华园

内容提要

本书系统论证了儒学内化发展中的《中庸》哲学思想。

本书认为，孔子的心性之学包括两个部分，即“心学”与“情学”。心有认知和良知两种功能，人有感性情感和道德情感两种情感。加强礼的学习和认知以规约培养感性情感，或者按照良知之心和道德情感行动，都可以成就道德。孔子之后，按照前者成就道德的是儒学之外化，其集大成者是荀学；按照后者成就道德的是儒学之内化，其集大成者是孟学。

儒学内化就是道德情感与良知之心内化为天命之性，成为道德实践的内在本体和形上根据。《中庸》作为思孟学派的早期作品，承担着为儒学建立道德本体和寻找道德终极根源的形上课题。在这两个课题中，道德情感都具有本质的意义，所以《中庸》初步建立起来的儒家形上学可以说是一种情感形上学。但《中庸》只完成了道德情感的内化，良知之心的内化是由孟子完成的。

宋明时期，孔子的“心学”得到充分发展，孔子的“情学”却隐而不彰。理学两派都属孔子的“心学”，朱子是孔子“心学”之认知派，陆王是孔子“心学”之良知派，两派的分歧是孔子“心学”内部的论争。直到明末刘蕺山，才重新认识到道德情感的重要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复归了思孟学派心性情为一的义理结构。

Abstract

This book systematically demonstrated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which wa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internalization.

In this book, the theory of mind and nature of Confucius comprises two parts: “the doctrine of mind” and “the doctrine of emotion”. The mind has two kinds of functions that are cognition and intuitive knowledge, and human has two kinds of emotions that are sensual emotion and moral emotion. Strengthening the study and cognition of Rite to regulate and cultivate the sensual emotion can achieve moral, as act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ind of intuitive knowledge and moral emotion can. After Confucius, the former is Confucianism’s externalization which synthesizer is the theory of Xunzi; the latter is Confucianism’s internalization which synthesizer is the theory of Mencius.

Confucian internalization is that moral emotion and mind of intuitive knowledge internalize into the nature conferred by heaven and then becomes the internal noumenon and metaphysical basis of moral practice.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s the early work of the school of Zisi and Mencius, undertakes metaphysical issues that are to construct moral noumenon and look for the ultimate origin of moral for Confucianism. Both in the two issues, moral emotion have essential meaning. So Confucianism’s metaphysics preliminarily constructed by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is a kind of moral metaphysics. But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just accomplished the internalization of moral emotion, while the internalization of mind of intuitive knowledge was accomplished by Mencius.

During Song and Ming Periods, “the doctrine of mind” of Confucius had sufficient development, however, his “the doctrine of emotion” was seldom

mentioned. Both schools of Neo-Confucianism belong to “the doctrine of mind” of Confucius, among which Zhuxi strands for the cognitive school while Lu-Wang strands for the intuitive knowledge schoo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chools belongs to the internal argument of “the doctrine of mind” of Confucius. It was until to Liu Jishan who was living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at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moral emotion was re-recognized and the principle structure of unity of mind, nature and emotion of school of Zisi and Mencius was regressed to a certain degree.

序

《中庸》作为儒家的经典，在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尽管关于其成书年代及作者仍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它在儒学演化中的独特意义，却无法否认。《中庸》的主题之一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表现为终极性的价值关切和价值追求，“道中庸”则强调通过日用常行以实现这种价值的关切，它以概要的形式体现了早期儒家将终极的关怀与日常存在联系起来的进路。终极关怀固然包含对日常存在的超越，但这种超越并不离开日常的生活。与之相关的是“致广大而尽精微”。“致广大”与“极高明”具有一致性，二者都内含对理想之道的关切，“尽精微”则可以看作“道中庸”的展开，它更多地要求深入具体的现实存在。这里无疑也包含精神的超越，但它不同于从天道出发的外在进路，而是植根于庸言庸行的内在升华。

可以看到，在《中庸》那里，价值本体不再具有超验的形式：《中庸》不同于《易传》的重要之点，即在于空前突出了日用常行在价值创造中的意义。尽管《中庸》并没有放弃形而上的本体（“天命之谓性”的命题即表明了这一点），但在道与庸言庸行的沟通中，日常的人伦关系及实践活动已被视为价值的现实源头。这样，有限的超越不再仅仅表现为离开日用常行，而是即日用而超越日用，亦即在日用常行中使生命获得永恒的价值，这也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内在意蕴。通过精神境界的升华与“庸德之行”的入世观念的融合，儒家的价值原则获得了更现实的品格。

与“道中庸”相联系，《中庸》的另一个基本观念是所谓“诚”：“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这里的“诚”既涉及天道，又关联人道。作为天道的“诚”具有实在的意义，指万事万物本然的、真实的状态；作为人道的“诚”则既表现为人的存在形态，也呈现为价值层面的规范，具有引导和塑造人自身的意义。从以上方面看，“诚”内在地体现了存在与

价值、实然与当然的统一。就个体而言，一旦达到了“诚”，便意味着形成了真实的内在德性，其行为也将超越勉强，能够自然地合乎规范。《中庸》所说的“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既包含了自觉，从而不同于自发的行为；也超越了自觉，从而区别于单纯的有为之。与之相关的“从容中道”则以普遍的规范化为人的真诚品格为前提：此时内在的德性已如同人的第二天性，出于真诚德性的行为也超越了人为的依循和努力，表现为自然为善。这是一种扬弃了自发与自觉之后达到的更高境界。作为存在形态与内在品格的统一，“诚”既有本体论的意义，也包含价值论的内涵。

诚作为内在的本体，具体表现为德性，而内在本体的确立，则相应地以尊德性为基本形式。在《中庸》看来，尊德性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过程，正如极高明必须道中庸一样，尊德性离不开道问学：“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所谓道问学，也就是通过学问思辨行，以达到理性的自觉。与孔孟荀一样，《中庸》将主体的理性自觉提到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并以此作为从外在天道走向内在本体（诚）的前提：“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诚作为天道，具有实然（本然）的性质，正是通过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实然（本然）之诚开始逐渐内化为对当然之诚——精神之境——的自觉意识，而这种自觉意识又作为内在的本体而制约着主体的行为。可以看到，尊德性（诚的本体之确立）与道问学（理性的自觉）之间存在一种互动的关系：立诚离不开道问学，而本体一旦确立，又保证了主体能够始终处于明觉状态；前者就是所谓“自明诚”，后者则是所谓“自诚明”，二者本质上又展开为一个统一的过程：“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由个体走向外部世界，《中庸》进一步提出了如下思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这一观念既有本体论的含义，也有价值观的意蕴。在本体论上，它意味着对象世界中的诸种事物都各有存在根据，彼此共在于天下；换言之，对象世界的不同存在物之间具有一种相互并存的关系。在价值论上，“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则涉及不同的个体、群体（包括民族、国家）之间的共处、交往问题，它以承认不同个体的差异、不同社会领域的分化为前提。个体的差异、

不同社会领域的分化是一种历史演化过程中无法否认的事实，如何使分化过程中形成的不同个体、相异存在以非冲突的方式共处于世界之中，便成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所指向的实质问题，后者同时也从形而上的层面，涉及社会的“和谐”。

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相联系的是“道并行而不相悖”。“道”在儒家哲学中不仅被理解为天道（存在的根据或存在的法则），也含有理想、价值原则等社会、文化的意义；“悖”是彼此的对立、冲突。“道并行而不相悖”，意味着不同的价值理想、价值观念不应仅仅导向彼此的冲突。在社会领域中，只要不同的个体、阶层存在，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就难以避免；试图使每一个个体认同绝对同一的价值观念，显然是行不通的。在此，问题不在于用独断的方式消除价值观上的差异，而是在差异业已存在的背景下，妥善地看待与处理这种差异。“道并行而不相悖”当然并不是在价值观上主张相对主义，这里的内在含义，是以宽容的原则，对待不同的价值观念。一方面，它并不否定价值原则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它又要求以非独断的方式来对待不同观念，后者与孔子所肯定的“恕”的观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致。

要而言之，《中庸》以中道和诚为其核心的观念，中道既蕴含把握“度”的原则，又展开为形上与形下、人与世界、日用与道之间的统一；“诚”则既表现为天道意义上实在性，也构成了人道意义上的道德之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则从本体论与价值观的统一上，将以上看法进一步展开了。

《中庸原论》原系杨少涵博士的学位论文，因主持其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这一机缘，我得以较早地阅读他的研究成果。作者对《中庸》思想考察之扎实、系统、深入，给我留下甚为深刻的印象。以儒学的历史演化为背景，作者具体地分析了《中庸》思想的内在特点，特别注重《中庸》内含的道德哲学、形上之学与情感的关系，突出了情感在《中庸》思想中的独特地位，由此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尽管作为探索性的研究，其中的一些看法也许可以进一步讨论，但它所展现的理论视域对推进《中庸》思想的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杨国荣

2013年2月4日

前 言

《中庸》重要，读史可知；《中庸》难读，世之共识。《中庸》的重要性，自不必多说。《中庸》号为难读，前贤已屡言及。如此重要而又难读，在儒家心性之学的经典文献中，少有能出其右者。这正是《中庸》的魅力所在。在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过程中，我之所以决定选择《中庸》作为考察对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想一睹《中庸》的这种魅力。

谁知道对这种魅力的追寻和求索却是一种精神的历练和磨难。在论文准备和创作的两年多时间里，我深切体会到，《中庸》实在是一本奇书，而以《中庸》之类的文献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实在太难。正如清儒王澐在《中庸本义》中所说：“古今文字之奇，无过《中庸》；观古今文字之难，亦无过《中庸》。”其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其本本文本数量太少。《中庸》的全部文本只有 3500 多字，算上现代标点，也不到 4500 字。我常开玩笑说，即使把《中庸》文本全部选中，再连续粘贴 30 次，也不过 10 万字左右，勉强达到文科博士论文的必要字数。在如此有限的文本上翻腾出二三十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且还要翻出花样，弄点新意，这就更有点儿赶鸭子上架。第二，其思想的可发挥性太大。哲学史中有一种现象：一个哲学文献，文本量少但重要，其思想的可诠释空间，其内涵的可开拓余地，就非常非常之大。道家的《道德经》是这种文献，儒家的《中庸》也是这种文献。北宋以后，《中庸》名声骤起，人们对其关注也日甚一日，往往一个字就能招来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大论。所以《中庸》自身的文本虽然不多，但由于其思想的可发挥性太大，由之而衍生的文献数量极其大。虽然很多衍生文献新意可能不多，但要想全面而深入地理解《中庸》思想及其流变，很多文献还必须涉猎，在这个地方无巧可讨。在准备和创作博士学位论文的规定时间里，完成这么大的查阅量而且要尽量消化，

常常有力不从心之感。

针对以上两点难处，在论文开题时，我对论文的整体构想是一种四平八稳的“三段论”，即“考论篇”“义理篇”和“流变篇”。考论篇主要是想全面考察《中庸》之文本流传，包括《中庸》的作者、成书、表章、分篇、改订甚至字数，以及在四书中的次第、与《论语》《孟子》《大学》的关系，等等。这样一来，就可以把考察的范围推得更开，需要占有的文献很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中庸》自身文本太少的难度。义理篇是想对《中庸》的内容作一些梳理和归纳。流变篇是在义理篇的基础上，大体考察《中庸》思想在儒学史上的发展和影响。这显然是为了化解由《中庸》衍生性文献太多所带来的麻烦。此后，我按照这种构想进行了大约半年的“原始积累”，收集了不少资料。尤其是考论部分，到2007年“十一”长假之前，已经收集到十几万字的读书笔记。我自认为已经把这方面的主要材料网罗殆尽，于是，就利用“十一”的七天假期写成考论篇（后来简化成为本书附论第一节）。

2007年12月，我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进行短期访问。访问期间，由于一个“刺激”，使我痛下决心，全盘抛弃以前四平八稳的“三段论”构想，重新布置论文的整体构架。访问过程中，我列席了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一个经典诠释方面的国际研讨会。一次用餐时，我向一位来自新加坡的中文系教授请教论文的相关问题。当他了解到我对论文的构想时，竟毫不客气地说，你的论文构想只有三分之一值得写，就是义理部分。他解释说，在新加坡，考论部分是中文系文献学的任务，流变部分是历史系思想史的任务，只有义理部分才是哲学系的重点所在；有什么哲学问题，直接说问题，不要东拉西扯，拖泥带水。最后他庄重地说，按照他们的体制，我的论文即使写出来，在哲学系也通不过。当时我心里肯定很不服气。但静下心来一想，觉得他的意见很有道理，“三段论”是文史哲的杂合，的确不能突出哲学论文的特色。（当然，他的这个建议并不新鲜，在论文开题时，导师组已经提出来，考论部分完全可以不写。）经过那位教授这么一“刺激”，我心中就多了一层想法，即全盘抛弃以前的构想，重新布局，突出问题，写出一篇味道稍微纯正一点儿的哲学论文。

从香港一回来，我就把这个想法报告给导师，获得同意后，我就着手重新置思整篇论文。又经过一年多的沉潜反复，强探力索，论文最终